

举业与为学：王守仁考试思想探析

张学强¹，王文娟²

(1. 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兰州 730070；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北京 100083)

摘要：王守仁以其心学思想为基础，倡揭“致良知”的教育目的观，注重学校教育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对科举考试的流弊进行了深刻批判，阐明了自己的考试观及考试心理思想。

关键词：王守仁；科举考试；为学；应试心理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4)04-0035-06

DOI:10.13763/j.cnki.jhebnu.esse.2014.4.007

科举考试时间跨度至千年、影响遍及政治管理、学校教育及社会生活等诸多领域，影响不可谓不大，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述不仅是一个持续性的历史性话题，也因围绕科举学的学术性探讨及其现实意义而成为当今学者越来越关注的焦点。科举之影响首在学校，科举考试之设计与制度安排及其实践化运行对学校教育有重要影响。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认为，“科举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但又有教育考试性质”，“科举对教育的影响，既有促进民间私学发展和书院的兴起、调动士子的读书积极性的作用，也有压抑求异思维、导致书院官学化、学校科举化等问题”^[1]。

有明一代，科举考试整体上摆脱了元代时断时续的状况，考试制度更趋完善，学校教育从规模与类型等方面又较元代有了新的发展，但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之间并未形成良性循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考试之流弊特别是对学校教育之控制与异化的弊端显现无遗。作为明代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王守仁一生以天下为己任，一方面面对“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然又人是己见，莫肯相下求正”^{[2](P814)}的学术不明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心即理”的人性论、知行合一的认识论及“致良知”的道德本体论，直指居于思想统治地位但日益僵化支离的程

朱理学，为沉闷的学术界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另一方面面对“士夫计逐功名甚于市井刀锥之较”^{[3](P884)}的士风，致力于教学授徒以期救治当世士风浇薄、人性虚伪、道德日渐沦丧的社会现实，如何处理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成为王守仁充满智慧与批判意识的教育思想核心问题，是其教育思想中诸多问题逻辑展开的前提性与基础性话题。

一、“业辞章、习训诂、工技艺”：明初至明中叶的科举考试观及其影响

明初，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太祖朱元璋崇尚儒学教化，招纳贤人志士，将治国策略定为衣食、教化。早在吴元年朱元璋便告诫右御史大夫邓愈等“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桑，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明太祖良训(卷一)》]

为了推行教化，同时出于遏制权豪势要及选拔治国人才的需要，朱元璋对自隋唐以来实施的科举选士制度进行了借鉴和改造，下令在洪武三年(1370年)八月开科取士，确立了科举制度在明朝人才选拔方面不可动摇的地位。史载，洪武三年，诏曰：“汉、唐及宋，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贵文学而不求德艺之

收稿日期：2014-01-20

作者简介：张学强(1971—)，男，甘肃会宁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史研究；

王文娟(1978—)，女，河北石家庄人，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全。前元待士甚优，而权豪势要，每纳奔竞之人，夤缘阿附，辄窃仕禄。其怀材抱道者，耻与并进，甘隐山林而不出。风俗之弊，一至于此。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

至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经靖难之役后，为笼络天下士子，树立自己儒家圣君形象，亲自主持编纂而成《四书五经大全》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并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四书解释的准则，定为科举考试的统一标准。程朱理学自此成为士人举子的必修课程，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揭开了以程朱等宋儒学说统一思想、排斥异端的序幕。这一举措直接造成了考试内容的狭隘和录取标准的单一，而考习程朱理学又逐渐成为进入政府高层的必经之路，“成祖初年，内阁七人，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

自永乐以后，历经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五朝，诸明皇帝恪守祖训，奉行儒学教化，科举选士制度和主导教育思想基本未变，如宣德三年(1428年)曾敕谕两京国子监：“我国家奄有天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致理兴化，率由学政，简道德以为师，明条制以立教，劝励勤至，廩养丰厚，士之成才，毕效于用。”[《明宣宗实录》(卷四十一)]天顺时期，英宗皇帝直截了当地说：“师生与学校，一切事务并要遵依洪武年间卧碑行，不可违。”[《明英宗实录》(卷三三六)]然至成化时期，科举考试业已弊端百出，而历朝的宦官把政，吏治腐败，兵革战乱对已是僵化黑暗的科场无疑犹如雪上加霜，士风和学风的堕落颓废可谓是其最显著、最直接的后果。“大凡一种学术思想，与一代的利禄相结合而成为统治思想，这是它的幸运，因为这样它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传播而兴盛。但也是它的不幸，因为从此它就可能被虚伪化，从而失去原有的青春活力”^{[4](P58)}。程朱理学也不例外，成为官方统治学术并与科举联姻后，很快在士人们趋之若鹜的追逐下流于功利化、虚伪化、知识化，也因此而日益支离、繁琐与僵化。

明代学校与科举融为一体，《明史》明确记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不可不由科举。”[《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学校作为培养科举人才的

主要场所，受科举考试内容的牵制，学生的学习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士人学子整日研读理学，除此之外别无学术，导致学风日趋脱离现实；读书人终其一生沉溺于词章训诂，墨守程朱旧说而无所创新，学术日益僵化，导致了“此亦述朱，彼亦述朱”的刻板局面，对学生思想的束缚也可谓是达到了极致，“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

对科举自身而言，科举选士录取标准的单一又恶化了学校教育内容的狭隘，加剧了士人学子对功名利禄的追逐，“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者，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然进士、举贡、杂流三途并用，虽有畸重，无偏废也。荐举盛于国初，后因专用科目而罢。铨选则入官之始，舍此蔑由焉”。[《明史》(卷六十九)“选举志一”]士子应科举必由学校，而政府任用官员主要在科举一途，自此莘莘学子争相猎取功名，留恋于名利场中，游弋于章句经义之间，士风衰薄，既缺乏躬行实践又脱离社会现实。“盖是时，仕进无他途，故往往多骤贵者。……自科举复设，两途并用，亦未尝畸重轻。建文、永乐间，荐举起家犹有内授翰林、外授藩司者。而杨士奇以处士，陈济以布衣，遽命为《太祖实录》总裁官，其不拘资格又如此。自后科举日重，荐举日益轻，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有司虽数奉求贤之诏，而人才既衰，第应故事而已”。[《明史》(卷七十一)“选举志三”]学术拘于一家，学风鄙薄；科场舞弊兴起，士习日陋。对社会而言，则是人才匮乏，青黄不接，天下士人多空谈，逐名利，经世致用之学衰退，思想领域一片沉寂。

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王守仁对明代科举考试观的批判

王守仁重视教育，一生以匡复圣学为己任，于戎马倥偬之际仍讲学授徒。他主张教以明人伦，学以为圣明心，对功利化的考试观及其负面影响进行了全方位的激烈批判，“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怀世道之忧者思挽而复之，则亦未知所措其力”^{[5](P253)}。

王守仁对世人“惟功利之为务”的教学风气深恶痛绝。他认为，“圣贤之学，其久见弃于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论及之，则众共非笑诋斥，以为怪物。

惟世之号称贤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讲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实，与其平日家庭之间所以训督期望其子孙者，则又未尝不汲汲焉惟功利之为务；而所谓圣贤之学者，则徒以资其谈论、粉饰文具于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诚心一志，实以圣贤之学督教其子，如处士者，可多得乎？”^{[6](P282)}由此可见，教者以博取功名为务，而所谓圣贤之学在当时只是人们对自己进行包装附庸风雅的装饰品而已。

求学的唯利是图必然导致学风的功利化与虚伪化，导致实用之学的不彰，王守仁对此深为忧虑：“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侵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圣贤之学。”^{[7](P283)}同时，科举考试以程朱理学为纲，致使士人学子谨守矩矱，思想僵化，倍受束缚。一切以朱子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敢稍加微辞，勤于章句而疏于修德，“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8](P56)}。

对士人精于辞章记诵，长于章句训诂所最终导致的程朱理学知识化及支离分裂的弊端，王守仁亦有论断：“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无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9](P226)}对程朱理学虚伪支离的深刻见解亦由此可见一斑。

王守仁认为学不以明心见性、求做圣贤为志，则良知不明，士风鄙陋，“后世良知之学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轧，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琐僻陋之见，狡伪阴邪之术，至于不可胜说；外假仁义之名，而内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实，诡辞以阿俗，矫行以干誉，掩人之善而袭以为己长，讪人之私而窃以为己直，忿以相胜而犹谓之徇义，险以相倾而犹谓之疾恶，妒贤忌能而犹自以为公是非，恣情纵欲而犹自以为同好恶，相陵相贼，自其一家骨肉之亲，已不能无尔我胜负之意，彼此藩篱之形，而况于天下之大，民物之众，又何能一体而视之？”^{[10](P80)}这些是风俗日下，吏治腐败的根源，也正是在对其弊端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王守仁形成了自己的关于为学举业、求仕治生的独到的考试思想。

三、“勉习举业，自无妨圣贤之学”：王守仁的科举考试观

尽管王守仁认为科举考试存在着种种弊端，但对于科举考试并不绝对地加以排斥。在他看来，作

为求禄仕的一种手段，科举考试从根本上讲并不妨碍圣贤之学，如果能树立正确的科举观，反而可以在博取功名的同时扩大圣贤学说的影响，也就是说，王守仁是在科举为我所用的观念下探讨举业与为学之间的关系。

(一)“饰羔雉”、“明学术”与“济天下”的举业目的观

王守仁认为求禄仕是为学者正常的人生追求，工举业是博取功名的重要手段，“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11](P168)}。他不仅肯定科举为进身之阶，进而主张要工于举业，工举业之用如同“饰羔雉”，不工于举业而以科举进身，是为“无礼”：“盖士之始相见也必以贄，故举业者，士君子求见于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饰，是谓无礼；无礼，无所庸于交际矣。故夫求工于举业而不事于古，作弗可工也；弗工于举业而求于幸进，是伪饰羔雉以罔其君也。”当然工于举业不是为了沽名钓誉，其前提在于致己之诚，济世之用，“羔雉饰矣，而无恭敬之实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饰羔雉者，非以求媚于主，致吾诚焉耳；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不知方其业举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12](P875)}。

王守仁还把科举作为“明学术”、宣传自己思想学说的阵地。从发扬学术的方式来说，王守仁别出心裁，围绕科举一途作文章，认为弟子门人求得功名可为自己扬名立说，增添得力助手，传播心学思想。《年谱三》记载：

(嘉靖二年)二月。南宮策士以心学为问，阴以辟先生。门人徐珊读《策问》，叹曰：“吾恶能昧吾知以幸时好耶！”不答而出。闻者难之。曰：“尹彦明后一人也。”同门欧阳德、王臣、魏良弼等直接发师旨不讳，亦在取列，识者以为进退有命。德洪下第归，深恨时事之乖。见先生，先生喜而相接曰：“圣学从兹大明矣。”德洪曰：“时事如此，何见大明？”先生曰：“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13](P1287)}

面对世人另类的眼光与朝廷政敌的非难，王守仁认为，无论是贬是褒，都会有利于其学说的发扬光大。对此目的，王守仁并不忌讳，而是直接了当、明明白白地告诫于弟子门人。嘉靖时，王龙溪弱冠举于乡，但未中第，遂授业于王守仁。在他再次应试

时,王守仁就表明了支持弟子通过举业扩大学派学术影响的态度:“丙戌试期,(王龙溪)遂不欲往。文成曰:‘吾非以一第为子荣也,顾吾之学,疑信者半,子之京师,可以发明耳。’先生乃行,中是年会试。”^{[14](P238)}

除了“饰羔雉”、“明学术”的目的外,“济天下”也是王守仁所倡导的举业入仕的目的。在王守仁看来,通过举业入仕为官,人生之旅虽少了些许情趣与快乐,多了几分重担和艰难,但却是有志之士解民于倒悬的人生使命,是能者为之的必然担当,在《别三子序》中对弟子讲:“今年三子者为有司所选,一举而尽之。何予得之之难,而有司者袭取之之易也!……三子行矣,遂使举进士,任职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进而归,咏歌优游有日,吾知其乐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9](P227)}

(二)“明人伦”的学校教育及其与科举考试关系的处理

王守仁认为:“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与学校之中。”^{[8](P54)} 学校教育首在培植德性,其次要因势利导充分发挥个人所长。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明人伦”,异端与邪说、伯术与文辞,及功利之徒、乱世之政,皆背此而行,至于科举考试,一定要以“明人伦”为其根本,“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伦”^{[5](P253)},“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伯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虽今之举业,必自此而精之,而谓不愧于敷奏明试;虽今之仕进,必由此而施之,而后天忝于行义达道”^{[5](P253)}。

1. 为学与举业并不相悖,关键在摆正两者之间的关系

王守仁讲:“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业举,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11](P168)} 勉习举业或学为圣贤全在立志坚定与否,即道德的修养程度,只要“成德”无论学什么都是殊途同归,只要立志做圣贤,勉习举业并不妨碍对圣贤之学的研习、体悟与践履,应以辩证的眼光看待两者的关系:“然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实学,无非道也。’而况于举业乎?谓举业与圣人之

学不相度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则虽终身由之,只是俗事’。而况于举业乎?忘与不忘之间不能以发,要在深思默识所指谓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则知学矣。”^{[11](P169)} 只要能正确处理为学与举业之间的关系,通过举业照样可以成就圣贤事业:“知洒扫应对之可以进于圣人,则知举业之可以达于伊、傅、周、召矣。”^{[12](P875)}

2. 为学之要立志为先,免于举业之累

在现实生活中,学者往往不能处理好为学与举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为举业所累”的情况,要解决这一问题,王守仁认为立志是关键。立志是为学的根本,志立才能学明。志对于求学者来说不仅关涉到为学的方向问题,还是学有所成的保障。王守仁讲:“夫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随俗习非,而卒归于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15](P259)},“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15](P260)}。

有志未必能成就事业,无志则无可成之事。他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今学者旷废隳惰,玩岁愒时,而百无所成,皆由于志之未立耳。”^{[16](P974)} 志之高下决定为学的境界和成败,志之所在就是学之所在。有什么样的志向,就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就有什么样的为学之路。确立了学为圣人努力目标,时时事事以圣人的规范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则是一条学为圣的求学之路,“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16](P974)}

在王守仁看来,确立正确的志向是免于举业的关键,志于举业则学为举业所累,而志于为圣则举业是为圣之功,“或问为学以亲故,不免举业之累。先生曰:‘以亲之故,而举业为累于学,则治田以养其亲者,亦有累于学乎?先正云惟患夺志。但恐为学之志不真切耳。’”^{[17](P30)}

3. 举业与为学的统一途径:注重心得,摒弃章句《年谱三》载:

德洪携二弟德周、仲实读书城南,洪父心渔翁往视之,魏良政、魏良器辈与游禹穴诸胜,十日忘返。问曰:“承诸君相携日久,得无妨课业乎?”答曰:“吾举子业无时不习。”家君曰:“固知心学可以触类而通,然朱说亦须理会否?”二

子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譬之打蛇得七寸矣，又何忧不得耶？”家君疑未释，进问先生。先生曰：“岂特无妨？乃大益耳。学圣贤者，譬之治家、其产业、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请客出其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还以自享，终身用之无穷也。今之为举业者，譬之治家：不务居积，专以假贷为功。欲请客，自厅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幸而来，则诸贷之物一时丰裕可观；客去，则尽以还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请客不至，则时过气衰，借贷亦不备，终身奔劳，作一寒人而已。是求无益于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大比，稽山书院钱樵与魏良政并发解江、浙。家君闻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13](P1292)}

这是一段饶有趣味并能引发人们深思的教育生活写照，通过鲜活的事件将王门教学的制胜法宝展示出来。王门教学强调向内探求良知，贵在心悟自得，注重事上磨练，在学术见解与为学路径上尽管与程朱理学龃龉不合，但却能通过“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说”的途径将良知之学与程朱理学主导下的科举考试这一看上去无法解决的矛盾轻松化解，既扩大了心学的影响，又能使数量众多的弟子在科举仕途上取得成功，使科举为其所用，这不能不说是王守仁教学的一大创举。

4. 以书院消解科举的霸权，为学术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对于书院的发展王守仁寄予了厚望。他认为官学之设，本为讲求圣贤之学，长期以来，制度不可谓不完备，但由于没有能很好地处理官学与科举之间的关系，官学以科举为风向标而动摇了立教之根本，“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骛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17](P253)}，因此书院之设“所以匡翼夫学校之不逮也”，其目的在于改变科举主导下颓靡功利的学风，振奋学子之精神，激荡学子之士气，给沉闷僵化的学术界注入活力：“譬之兵事，当玩弛偷惰之余，则必选将阅伍，更其号令族旗，悬非格之赏以倡敢勇，然后士气可得而振也。今书院之设，固亦此类也欤？士之来集于此者，其必相与思之曰：‘既进我于学校矣，而复优我于是，何为乎？宁独以精吾之举业而已乎？便吾之进取而已乎？则学校之中，未尝不可以精吾之业。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14](P253)}

四、“勿以得失横在胸中”：王守仁的应试心理思想

对于如何做好考试前的准备及如何保持良好的考试心态等问题，王守仁也有许多论述，值得我们加以汲取。

(一) 考试前的身心调整

王守仁一直认为为学与修身养性本为一事，因此健康的身体很重要，在应试前应做好必要的身心调整。他认为考前要注意饮食调适，合理膳食对休养身体来说是首当其冲的，指出“厚食浓味，剧酣谑浪，或竟日偃卧”便会导致“挠气昏神，长傲而召疾”。正确的做法是：“务须节饮食，薄滋味，则气自清；寡思虑，屏嗜欲，则精自明；定心气，少眠睡，则神自澄。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致力于学问者，兹特以科场一事而言之耳。”^{[18](P911)}

王守仁对考试前的作息规律、习惯养成非常重视，他认为应该早作准备，逐日形成习惯：“将进场十日前，便须练习调养。盖寻常不曾起早得惯，忽然当之，其日必精神恍惚，作文岂有佳思？须每日鸡初鸣即起，盥栉整衣端坐，抖数精神，勿使昏惰。日日习之，临期不自觉辛苦矣。”^{[18](P911)}对习惯养成过程，他还十分强调不可久坐致使疲劳，或熬夜倦怠致使神昏气浊，“每日或倦甚思休，少偃即起，勿使昏睡；既晚即睡，勿使久坐”^{[18](P911)}。

在考前学业处理方面，王守仁认为临近考试，再去温习学业只会扰乱心神，消耗精神，可以看一些消遣的文字以自我放松：“进场前两日，即不得翻阅书史，杂乱心目。每日只可看文字一篇以自娱，若心劳气耗，莫如勿看，务在怡神适趣。”^{[18](P911)}身心的放松，还可以通过静坐默思：“每日闲坐时，众方嚣然，我独渊默；中心融融，自有真乐，盖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18](P911)}

(二) 保持良好的考试心态

在王守仁看来，求学应试是学为圣的一条路径，为的是能使所学大行于天下，科举中第并不是最终目的，所以在考场内外都应心平气和，不以得失为患，如此才能专心致志正常发挥。否则，得失充盈胸间只会分心，反而有害于考试。他说：“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则大惑矣。入场之日，切勿以得失横在胸中，令人气馁志分，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8](P911)}他还认为得失之念会令人志气局促，因为一心不可二用，倘若如此便是未尽人事，心有不敬，即便侥幸得中，也不值得骄傲自豪，“今人入场，有志气局促不舒

展者,是得失之念为之病也。夫心无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凡事宁有成耶?只此便是执事不敬,便是人事而未尽处,虽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贵也”^{[18](P911)}。

如何保持心态的平和,王守仁认为重要的是去除胜心:“诗文之习,儒者虽亦不废,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组织,未有不起于胜心者。先辈号为有志斯道,而亦复如是,亦只是习心未除耳”^{[19](P185)}。

关于考中技巧,王守仁认为考试审题是关键所在,只有得了题意大概,然后放手去写,不拘泥于文字词藻的制约,才可有神来之笔。他说:“场中作文,先须大开心目,见得题意大概了了,即放胆下笔,纵味出处,词气亦条畅”^{[18](P911)}。

总体上说,王守仁论科举,有许多精辟阐述,其关于科举与为学的论述亦有诸多借鉴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参考文献:

[1] 刘海峰. 科举学的教育视角[J]. 理论月刊, 2009(5).

[2]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答储柴墟[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送别省吾林都宪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4] 张祥浩. 王守仁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5]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万松书院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6]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书黄梦星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7]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书林司训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8]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答顾东桥书[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9]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别三子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0]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答聂文蔚[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1]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寄闻人邦英邦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2]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重刊文章轨范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3]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年谱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4] 黄宗羲. 明儒学案·浙中王门学案二[M].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15]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示弟立志说[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6]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教条示龙场诸生[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7]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8]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示徐曰仁应试[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9] 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与杨仕鸣[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Wang Shouren and his ideas of examinations

ZHANG Xue-qiang¹, WANG Wen-juan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Ethnic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2.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is psychological researches, Wang Shouren advocates innate moral consciousness in that schools should focus on the moral education. He criticiz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elucidates his own view points of examinations.

Key words: Wang Shouren; imperial examination; academia; psychology of examination

[责任编辑 高小立]